



书名：《世变下的五代女性》
作者：柳立言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演绎别样的五代社会史

在中国两千多年(公元前221~1911年)的帝制时代,有两个历史时期最为混乱,一个是东晋五胡十六国,一个是唐末五代十国。帝王将相的厮杀,在分裂状态下尤为惨烈;刀光剑影下的人生百态,也在后世的演绎中光怪陆离。由于现场混乱难以留下信史,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尤其是女性史料匮乏,给家庭史、社会史研究者带来不小的困惑。

基于此,台湾宋史专家柳立言先生带领他的读书会,从为数不多的五代女性墓志碑文中,爬梳有效信息,以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的“缺席者”——妇女为主角,还原一个个五代家庭史和社会史片段,汇成了《世变下的五代女性》一书。

还原鲜活的五代女性形象

诚如美国宋史研究专家伊沛霞在《追忆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前言中提及女性墓志时所言：“正史和说教性的烈女传往往只注重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段,而墓志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图像,展现了女性在一生各阶段中所担当的角色。”记载女性生活的墓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墓志写作通常有几乎固定的模式,而且盖棺定论之时,通常都隐恶扬善,不乏溢美之词,甚至有诬墓之嫌,这就容易给人以墓志主人“千人一面”“万众一德”的印象。

如何透过惯常写作套路的面纱,剔抉有效信息,还原出鲜活的女性形象?我们庆幸地看到,在“史学六问”“数馒头”等科学手段之下,墓志主人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将墓志内容按照“5个W,1个H”——时(when)、地(where)、人(who/whom)、事(what/which)、原因/是否(why/whether)、经过(how)分门别类;并将墓志关键词以至文句搬运至各自内容门类(比如为女受教、为媳奉姑、为妻事夫、为母训子等本人业绩)之下;再通过数字数,获悉墓志中最重要的内容。

以《难道是不孝子与负心汉》《法律人妻的欢与愁》为例,通过对读,拆解姚爽的儿子姚焕为其母亲米氏撰写的墓志、姚爽为妻子米氏撰写的墓志、北宋理学家劬雅撰写的姚爽的墓志、姚爽后妻李氏所生儿子姚燁为其母撰写的李氏墓志,我们可以想见姚爽前妻米氏、后妻李氏的形象,以及她们的欢喜和悲愁。

在以男性精英人物为主体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库中,这两位看似平凡的女性,意外地留下了明晰的身影。一个是虽来不及享受富贵但是获得了心怀歉疚的丈夫的爱怜以及有出息的子女的爱戴,一个是妻凭夫贵获封五品诰命夫人(县君)却魂归佛国“无恨”而终。这些印象的获得,靠的是对几个墓志的反复拆解和对比,并结合其他史料中的相关内容。

让历史有温度可感触

经过剖析解读墓志,五代女性那被忽视的经历、被淹没的贡献,逐渐清晰起来,乱世之中的女性同男性一样,为了自身生存和家族兴旺努力奋斗。我们看到,墓志中的女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角。当然,我们不能以今日“独立自主”的标准去看待五代女性,毕竟家族框架下的女性,不可能取得家庭范畴之外的工作或独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应该看到,主内与主外只是分工不同,只要各自都得到尊重,就不能论定女子缺乏自由与自主。而且即便是“相夫教子”,一些具体细节也可以给现代人以启迪。五代女性不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恪守“三从四德”,唯唯诺诺的“受气包”,而是大有可为,这于她们一生各个阶段的经历见分晓。

本书墓志中记载的五代女性,其一生的活动与经历都与男性有关,不论在家受训为出嫁做准备,还是奉姑、事夫、教子、睦族、持家保业,都是在为别人操劳,但其中不乏寻找自我的努力,不应该被埋没。

综观之,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与艺术各领域之外的五代女性,在墓志中反倒通过身份、地位、家庭、婚姻、阶层变化的揭示,侧面反映出那个动荡年代时而血脉贲张,时而悱恻悲怆的紊乱脉搏。她们的一生作为虽然逃不出家庭家族网络,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文武交流。在条分缕析、可靠材料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演绎出一部别样的五代妇女史,家庭史与社会史。说“别样”,并非指作者刻意颠覆正史叙事,而是其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让个体女性在具体角色中正常展示并局部放大,让这一“沉默群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到应有的反映与呈现,让历史有温度,可感触。

可敬的还有柳立言先生及其学术团队严谨的治史态度:既不随大流“男尊女卑”,同时也避免“孤芳自赏”“重女轻男”,不会为了反对“千人千面”而炮制出“百人百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论是墓志碑文分段分行的编排、表格数据的整理、墓志内容的拆解对比,还是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无一不清晰呈现研究过程、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此授人以渔的慷慨,相信必会使更多学人因此受惠。

(来源 新华网)

苏东坡开煤矿

□潘宝余

苏轼、苏东坡的文名,官誉、政声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从事开煤矿,解决百姓的烧柴,冶铁利器,还是鲜为人知的。发掘他的功绩,对伟人的颂扬,丰富祖国矿业史也是好事。

苏轼22岁进士及第后曾在基层干过一段时间。后被调往京师。因屡次上书不被重视,多次出头,受到打击。被外派到杭州,密州做地方官。42岁,到徐州做太守。积极实现自己勤政爱民的伟大抱负。到徐州后,很快遇到了水灾。黄河决口附近45个县被淹。冲毁农田300多万亩。洪水很快到了徐州城下。苏轼带领全城军民昼夜奋战,筑堤防水,引流外泄。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当地老和尚建议,集中力量凿开清冷口,把积水引入黄河故道,徐州城就安全了。苏东坡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场护城的斗争胜利了。人们看到苏轼吃住在防险第一线。也传出了“三过家门不入”标榜历史的美谈。为此,皇帝下了一道圣旨,通令他抗洪有功。也批准并拨款他提出的修建外城一劳永逸的防洪保城计划,苏轼受到很大鼓舞。

苏轼在抗洪胜利后曾经走访民间,查看灾情,了解老百姓的要求。文人总有文人的情趣。他当时写了一首《浣溪沙》的词说“旋抹红妆使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写的是太守寻访,农村妇女们急忙梳洗打扮,看太守的尊容,一览大诗人的风采。女人们噙噙喳喳地站在柴门口儿,由于互相争看,踩破红裙。走访中,百姓普遍反映到冬天烧柴十分困难,做饭取暖都成问题。苏轼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还是听取群众的意见,自己也动脑筋。他多方调查,更是他知识渊博起了作用。他知道徐州境内的铜山县盘马山,这地方有铁矿,境内也许还有煤矿。他查阅当地有关方志发现,汉朝王莽掌权时,曾让徐州每年向朝廷进贡五彩土。而五彩土,相传是女媧炼五色石补天的残物可以燃烧。这样苏东坡就派出人马。访人,探山,到处查找线索,自己亲自坐镇,靠前指挥。

苏轼到徐州的第二年,宋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12月,终于找到了一处煤炭宝藏。当时不叫煤炭都叫石炭。他立即组织人马大力开采,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苏轼自己欣喜若狂,他高兴地写下《石炭》诗一首。诗前小序是这样写的:彭城(即徐州)旧无石炭,元丰元年12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诗的原文如下: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
城中居民风裂肝
湿薪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
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
阵阵清风自吹散
投泥泼水愈光明
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
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
要斩长鲸为万段

歌颂煤炭的诗,往往提到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的《咏煤炭》,他的诗气势磅礴,饱含深情,赞美了煤炭破夜回春的伟大力量。驱寒发光的重大功效。是被称颂的一首好诗。但苏轼的诗,从时间上比于谦的诗早300多年,应该是我中国最早的歌颂煤炭的诗作了。更可贵的是,苏轼不但是文学家诗人官员,还是直接领导,勘探和开矿的实业家。他的诗写出了人民在烧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现煤炭的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也写出了“南山栗林渐可息,北方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的伟大胸怀。老百姓有了烧柴,森林的树木可以保护下来,而又可以促进冶铁业的发展,提高兵器质量,我们以为有了苏东坡开矿的史实,对彰显他的为人是有意义的。



闲着也是闲着,
何不读书?
忙时读“稀”,
手机阅读也是读,
闲时读“干”,
书中自有好干货

《浮世花鸟绘》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受到中国花鸟画的影响,日本形成了独立的花鸟绘体系。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浮世绘成为绘画的主流,花鸟绘作为其中的分支,自开一派风雅世界。花、鸟、鱼、虫,甚至传说中的神兽等都属于浮世花鸟绘的创作题材。

该书沿着浮世花鸟绘的发展轨迹,解读百余幅名家之作。从初始阶段的质朴到巅峰时期的震撼,浮世花鸟绘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出独具特色的传世经典。同时,书中各种花鸟趣闻、历史故事、文化知识为花鸟绘的日雅世界锦上添花。

(来源 人民网)

DK食物的故事：美味食材的溯源之旅

译者:覃清方 陈奕橙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食物百科全书,带领读者一起探索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材背后的故事。书中不仅引用了大量的插图、当代艺术作品和广告图片,以及引人入胜的照片,还涵盖了大量有趣又有用的信息,餐饮界专业人士可作为补充性质的专业书籍阅读,普通大众也可作为茶余饭后增加谈资和增长知识的实用图书阅读。

(来源 人民网)

微经典

古代是如何测定风向的

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风向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古代行军作战中也需要考虑风向的影响,《三国演义》便有借东风一说。因而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多种仪器用来测定风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以测定风向的仪器也有了很大变化。

汉代时,人们通过一种名叫“相风铜乌”的“铜乌”来测定风向。所谓“相风铜乌”,就是以铜铸成的,形似乌鸦的仪器。它被安置在观测天气气象的灵台上,风一吹就会随之转动,乌鸦头所对的方向就是风向。

到了晋代时,人们对“相风铜乌”在材料上进行了改进,制作出木制的相风乌。因为木制的更加轻便灵巧,因此逐渐流行起来,取代了铜制的相风乌。

然而,“相风木乌”虽然轻便了很多,但在军中使用仍然不是很方便,构造也略微复杂。因为军队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测定风向也就变得很麻烦,所以相风器越简单越好。唐代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提到,军中相风,用的不是相风乌,而是鸡毛。

军中用鸡毛测定风向不是随便拿来根鸡毛就能用,而是要选好鸡毛后,将其用细绳编织后扎在杆上,待其随风平飘时,便可确定风向。做成这样一个风向器,大约需要五两鸡毛,因此它又被叫做“五两”。唐代以后,“五两”在军中被广泛用来测定风向。宋代贺铸的《木兰花》词中写道:“朝来著眼沙头认,五两竿摇风色顺。”随着“五两”的广泛应用,“五两”这个词也成为各种简易风向器的代称了。